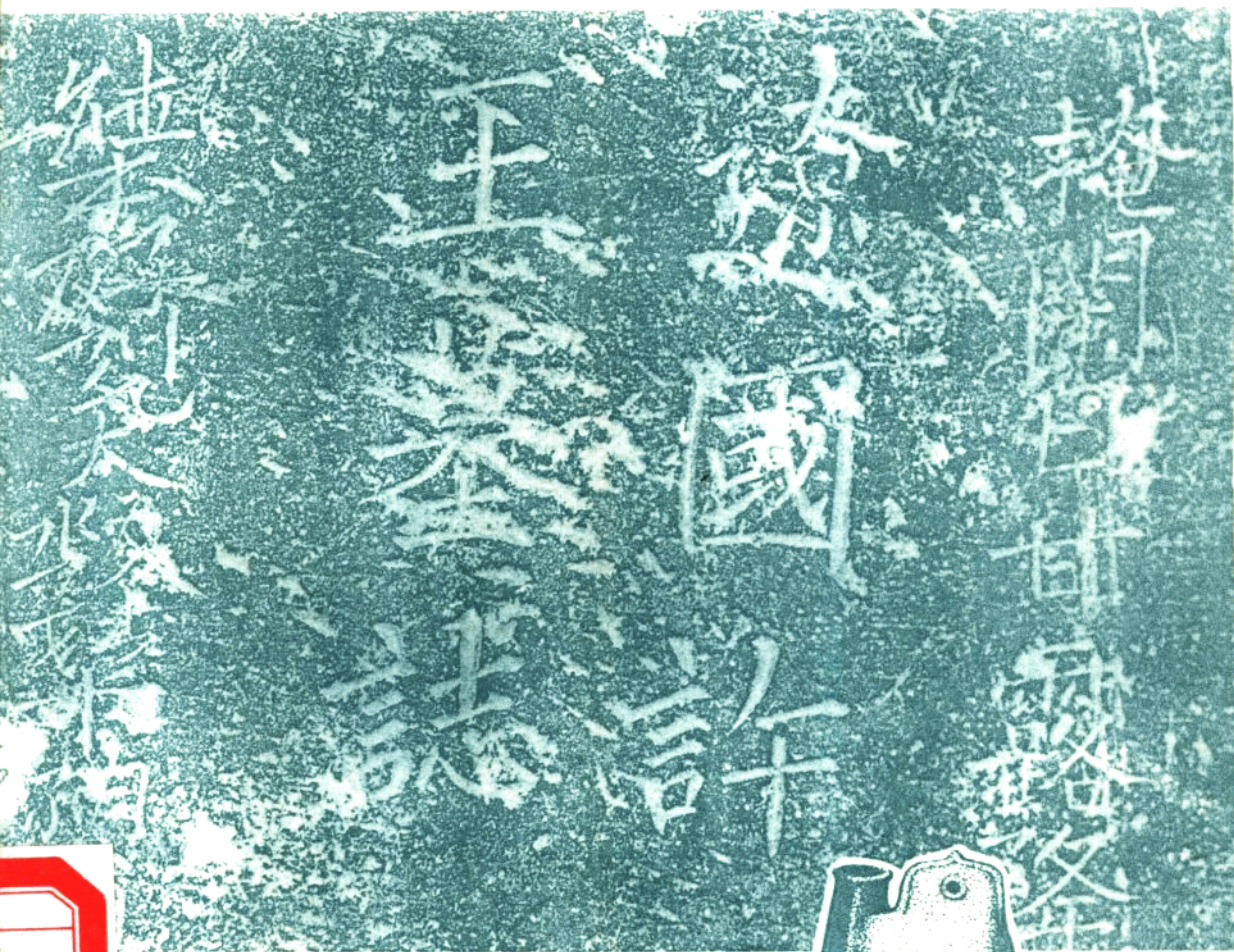


阜新辽金史研究

第二辑

● 阜新市辽金元契丹女真蒙古族历史考古研究会编



• 1995 •

阜新辽金史研究

第二辑

主 编 纪 兵

刘国有

副主编 李品清

陈志健

佟宝山

一九九五年九月

辽阜出临图字[1995]第 031 号

阜新辽金史研究(第二辑)

主 编:纪 兵 刘国有

副主编:李品清 陈志健 佟宝山

封面题字:朱子方 封面设计:赵泉来
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 字数:399千字
1995年9月第一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

工本价:15.00元

目 录

序	孙进己(1)
陈述先生的生平、师承及学术贡献	刘凤翥(2)
文明发端 玉龙故乡	郭大顺(8)
中华第一村揽胜	干志耿(10)
龙源考	刘国有(16)
阜新地区古代遗存研究综述与思考	李品清(20)
近年来我国契丹史研究述略	黄凤岐(26)
谈辽朝同中原王朝及邻国、邻部的关系	刘广元(35)
论辽代从尊儒到崇佛的演变	李敬武(40)
契丹族在阜新地区遗迹综析	王弘达(45)
论蒙元时代契丹人的贡献	佟宝山(49)
历史上的土默特左旗	暴风雨(53)
阜新地区最早的州治——豪州	魏奎阁(57)
阜新地区辽城考记	孙杰 高庆升(58)
阜新境内古长城和柳条边考略	张守三(63)
《辽东行部志》胡土虎寨、小兰若考	李福彬(67)
彰武墩台考	陈志健 白瑞年(71)
都尔鼻城在今新民县梁山考	孟辉(76)
都尔鼻城为彰武四方城古城遗址考	陈志健 白瑞年(81)
查海遗址发掘又获新成果	辛岩(86)
试析查海遗址的原始农业	胡健 刘小鸿 纪岚(88)
辽宁阜新平顶山石城址发掘报告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92)
阜新发现距今三千五百年灌溉水渠	辛岩 崔兴锐(112)
辽懿州城宝严寺塔记	刘谦 刘颀(114)
阜新南皂力营子一号辽墓	辛岩(118)
阜新广玉泉村塔记	刘谦 刘颀(127)
辽欢州塔记	刘谦 刘颀(128)
辽宁阜新于寺出土鍍金铜像	吕振奎(130)
彰武县后房身发现金代窖藏铜钱	胡健 李丽新(132)
辽宁阜新市出土四方金代官印	赵振生(136)

彰武县发现多起窖藏钱币综述·····	汪艳敏 孙杰 张春宇(137)
阜新县红帽子乡辽塔地宫清理记·····	赵振生(147)
海棠山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补释·····	刘凤翥(149)
辽《白山院舍利石匣记》考·····	李宇峰 李品清(152)
辽宁阜新海棠山发现契丹小字墓志残石·····	吕振奎 袁海波(156)
《吕舟大师行记》浅说·····	张九成(159)
辽晋国夫人墓志铭补议·····	魏奎阁(161)
辽宁彰武发现金代祐先院碑·····	李品清(163)
海棠山普安寺摩崖造像考·····	张九成(167)
著名史学家耶律俨·····	纪兵(169)
契丹王朝的缔造者耶律阿保机·····	纪兵(172)
肖德温妻孥考·····	魏奎阁(178)
萧绰与叶卡特琳娜二世改革之比较·····	张文华(18)
萧绰用人的特点和作用探析·····	张志勇(183)
辽开国皇后述律平·····	纪兵(188)
辽代阜新皇族外戚综述·····	吕振奎 魏奎阁(192)
元代契丹名士耶律有尚·····	佟宝山(198)
契丹民族精神与近世北中国区域文化特色·····	艾荫范(202)
匈奴语管见·····	韩景林(208)
论辽王朝的法律制度·····	刘国有(213)
阜新县发现契丹耶律氏后裔浅析·····	陈志健(216)
《辽史》传论的文化性质初探·····	张志勇(224)
阜新辽代佛教文化初考·····	李品清(229)
辽代籍帐制度初探·····	李志(233)
契丹族的装饰习俗初探·····	袁海波(237)
“真子飞霜”铜镜浅析·····	李丽新(240)
试论辽代火葬制度·····	袁海波(242)
玉·龙的故乡——记查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阜新日报记者专稿(244)
契丹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阜新召开·····	李品清(246)
市历史考古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贺信·····	朱子方(247)
市历史考古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贺信·····	孙文良(247)
辽、冀、内蒙古六市开展辽金史研究协作活动·····	李品清(248)
后 记·····	(249)

序

《阜新辽金史研究》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作为一个市竟在几年间连续拿出两本研究辽金史的集子，成绩是非常突出的，特别是在当前学术研究不景气的情形下，能拿出这样的成果更为难得。而且这一本更胜于前一本。如果说第一辑还是以外地研究辽金史学者的文章为主，那么第二辑已是以阜新本市学者的文章为主了。这一本又更难于前一本，因为第一辑是积建国以来数十年的成果，而第二辑却仅是近数年间的成果。数年间竟能拿出和以前数十年同等数量的成果，又主要靠本市学者的力量，而且基本上是兼职研究人员，确实是难能可贵。

当前，不少人纷纷下海，弃学经商；不少人悲观失望，放弃研究。而阜新市的学者却稳住阵脚，坚持研究，拿出成果。这说明什么？说明了阜新的学者对学术研究始终有坚定的信心，他们坚信所从事的辽金史研究，是对社会有用的，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添砖加瓦，正是有了这样一个认识，才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坚持研究，取得成绩。

他们不是没有遇到困难；撰写论文缺乏必要的资料，因为当地没有专业图书馆提供他们必要的图书资料，全靠自己到处搜集；出版著作缺乏必要的资金，因为当地没有专门的科研经费，全靠自己设法筹措。因此，他们的成就给我们说明了一条真理，当前虽有种种困难，但只要下定决心，一定能克服困难，取得成绩。阜新学者能做到的，全国各省市学者也应该能做到。

事实也证明了这点，除了阜新以外，全国还有许多市在不同程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内蒙的赤峰、河北的承德，吉林的白城，黑龙江的克山、佳木斯，辽宁的抚顺、本溪、丹东、营口、铁岭，都在当地辽金史学会的努力下，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取得了一批成果，即将陆续出版。

坚持就是胜利，相信在阜新学者成绩的鼓舞下，全国各地的辽金史会员将能更增强信心，力争金^呼出自己的学术成果。相信在四年后我会第七届年会召开时，会有数十个市都能像阜新市一样拿出自己的成果，使辽金史研究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欣欣向荣。

待

孙进己

1995年9月

陈述先生的生平、师承及学术贡献

刘凤翥

一

先生姓陈讳述字玉书，原名锡印，河北省乐亭县罗庄人，1911年10月20日生于耕读之家，父讳履成，母李氏。先生行二，其兄讳晋书。先生幼时随父在村塾中读书，聪明好学，成绩优异。全县两次会考，均得第一。

先生12岁丧母，1927年入北京香山慈幼院附设中学读书。未及一年，因该校停办而转学至设在宣化的直隶省立第十六中学读书。1929年，又转学至北京求实中学（现在的北京第二十二中学）读书。同年初中毕业，同时报考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均被录取。由于先生之父甚慕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的陈垣（字援庵）教授之名，鼓励先生读师大，先生奉父命上了师大而没有上北大。一年之后，转入大学本科历史系。

当时北大和师大的名教授并不固定在一个学校讲课，都互相串着讲课。先生在大学期间，曾经聆听过许多史学大师和国学大师的课程。例如朱希祖的《史学概论》，钱玄同的《清代学术思想》、吴检斋的《国学概论》、陈垣的《史源学实习》和《史学名著评论》、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陆懋德的《考古学》等等。

由于受父亲影响，先生极为崇仰陈垣先生，因而对陈垣教授的课极感兴趣，对于陈垣先生布置的作业做起来极为认真细心。深得陈垣教授的器重和提携，为陈垣教授的高足之一。在陈垣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大学期间即开始了学术研究活动。1933年《师大月刊》第六期发表了先生的处女作《蒋心余先生年谱》，文章长达41页，约6万余字。文章征引书目达123种之多。编者发此文时，在陈述先生的署名前加了“历史系三年级”两行6个小字，以表明先生当时的身份。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还铅印刊行了先生的小册子《陈范异同》一书，即比较《三国志》作者陈寿和《后汉书》作者范曄的史学方法和史学观点以及他们的著作内容之异同。同年，先生又撰写《补南齐书艺文志》，被开明书店于1935年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达24页之多。同年，先生还撰写了《金史氏族表初稿》经陈援庵先生向傅斯年（字孟真）先生推荐，此文得以发表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5年第五本第三分册和第四分册。因而被当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先生看中。

大学三年级时的某日，先生突然接到罗常培（史语所秘书）的电话，罗命先生去史语所与傅所长面谈。先生与傅所长的面谈极为融洽，当面约定，大学毕业后来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

1935年3月，先生大学尚未毕业即因看《金史氏族表初稿》校样而提前搬到史语所去住。当年9月，大学毕业，即去史语所上班，专门从事辽金史的研究工作。先住在北京北海内的蚕坛，后住在北京北海静心斋，这都是史语所的单身宿舍。

1935年年底，先生随史语所迁往南京北极阁。

1936年秋冬之际,先生曾出差回北京查阅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存原为缪荃孙搜集的艺风堂辽代碑刻拓片,为辑《辽文汇》作准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先生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迁。先迁至武汉,后又迁至长沙。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驻在长沙圣经学院的西北楼。紧接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也迁到长沙圣经学院来,组成临时大学(后来迁到昆明后才叫西南联大)。史语所第一组即历史组组长陈寅恪教授经常去临时大学上课,陈述先生协助陈寅恪教授备课。

先生后来随史语所迁到昆明,先生是携带家眷绕道越南和老挝而进入云南的。

1939年,先生由于研究工作成绩优异,被提升为研究员,是当时史语所最年轻的研究员。

1940年,先生被借聘到内迁至四川省三台的东北大学史地经济研究室(金毓黻为室主任,后改为文科研究所)任教授。在该室所办的《东北集刊》上发表了《头下释义》、《契丹女真汉姓考》、《越里野利逸利越利诸族考》、《刘敞使北诗笺江》、《跋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书张纶撰陀罗尼经幢记后》等文章。

1943年,先生因研究辽金史的卓越成就,曾获得哈佛燕京学社颁发的奖金。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负责押送史语所物资迁回南京的工作,完成任务后,先生即应周谷城教授之邀,去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月薪与周谷城相等,均为银元630元,比楚图南还多100元。先生还兼任暨南大学教授。

1947年,先生返回阔别多年的北平,任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燕京大学和中法大学教授。在此研究所发表了专著《契丹史论证稿》并着重研究了乱军问题。

解放后,先生又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授。

1952年,经翦伯赞先生推荐,先生调往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研究部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为民族图书馆的图书建设工作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采购了大量善本书和珍贵资料。在研究部工作期间,除了继续研究辽金史之外,还根据国家的任务,研究了达斡尔、赫哲、鄂温克、土族等北方民族的族源问题,发表了一些系列有关这方面的文章。

1957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划归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先生也就成了民族研究所的三级研究员,兼东北内蒙组组长。

1962年,先生开始招收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任导师。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民族研究所划归此院。先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兼民族历史研究室东北组组长。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先生兼任研究生院民族系教授,招收硕士研究生5名,任导师。80年代,先生又兼任博士研究生导师,招收博士生1名。

先生1987年退休。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2年1月5日零时15分,先生因病卒于北京西苑中医医院,享年80岁。同月17日,火化。同年4月4日,卜葬于北京海淀区北安河乡大觉河(辽代的清水院)内之西原,夫人吴富荣女士的骨灰亦附葬于内。

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员,北京市历史学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和第六届顾问。

先生为了推动辽金契丹女真史的研究工作,积极从事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的发起、筹备和创始工作。1982年学会成立以来,十年间,先生历任会长,主持召开了四次全国性的和一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

先生为中国辽金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早在解放前,先生就与同时的冯家升、傅乐焕被学界誉为我国“契丹史三杰”。三杰之中,由于先生独享寿考,因而笔耕时间最久,学术著作最丰。

二

先生终生专攻辽金史,学有师承、造诣精深、学识渊博、著作等身。

先生的师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为陈援庵先生传承的乾嘉朴学,二为陈寅恪先生传承的国外传入的科学方法。陈述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也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先生在大学学习期间,陈援庵先生的《史源学实习》课程对先生影响颇大,此课主题主要是传承的乾嘉学派的汉学方法,即对史料的探源,辑佚补佚和校勘等工作,这些工作需要下硬工夫,也最能体现功力。陈述先生的早期著作《陈范异同》即是《史源学实习》一课的作业经援庵先生批改后推荐给北师大出版部于1934年铅印刊行的。《补南齐书艺文志》是参照南北朝时期的各种文献记载撰成的,在此文的后记中先生提到“南齐书艺文志为史学课外习题之一。”

最能反映陈述先生在大学期间学术成就的也最能反映先生受援庵先生影响的当推《金史氏族表初稿》六卷,近10万字。1935年5月3日陈述先生为此文写的后记中说:“述撰此稿,吾师援庵先生时时启诲,体例排比,多承师命,今当印讫,聊申源溯。”朱希祖也曾谈到陈先生写此文的渊源:“余于民国二十一年,教授于北平师范大学,得陈生述,笃志著述,坚定弗回。时余为后金国汗姓氏考,读《金史·百官志》黑号白号之姓。又读姚燧《牧庵集》布色君神道碑白书黑书之姓,颇于金源氏族有研究之志。因规定凡例,指陈材料。嘱陈生仿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之例制《金史氏族表》。越年余,余为广州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主任,陈生适成此文,现将例言寄示,颇精审不苟。”^①这都说明陈先生的此文是在陈援庵和朱希祖二位大师的指导下完成的。陈先生的后记在提到此文写作经过时说,“述始读《金史》,感女真姓名驳离,深为苦之,读至百官志,渐觉有线索可寻,往复比较,始稍辨习。凡遇金源人名,辄随手钩乙,积日既久,朱墨满卷,因略仿钱氏之例,著手编缀,四五年来,灯窗暇日,手此一卷,未敢中辍也。”所谓“钱氏之例”指钱大昕的《元史氏族表》。说明在大学一二二年级时即开始着手撰写此文,用时达四五年之久才完成。发表时才24岁,此文是对女真族的每个姓氏中的每个人,凡能列出谱系者都一一列出,并注明出处,是使用起来极为方便的工具书。解放后此文与《女真汉姓考》、《金赐姓表》、《金史同姓名表》、《金史异姓名表》辑在一起,以《金史拾补五种》的书名由科学出版社于1960年正式出版。

在陈援庵先生的辅导下,陈述先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发表了《陈范异同》、《蒋心余先生年谱》、《补南齐书艺文志》和《金史氏族表初稿》4篇论著,近30万字。陈援庵先生不仅辅导陈述先生写论文,给陈述先生批改论文,还把陈述先生和陈述先生的论文推荐给傅斯年,使陈述先生的论文得以在当时最高级刊物《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并使陈述先生大学一毕业就进入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去从事专门研究辽金史的工作。援庵先生犹如助推火箭,陈述先生犹如人造地球卫星,一下子就发射到理想的高度。这种深厚的师生关系,堪称佳话。

陈述先生进入史语所之后,研究方向集中在辽史。仍然按着陈援庵先生所指引的学术路子

^① 朱希祖《金源姓氏考》前言。载《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2卷第三、四期合刊号,1934年1月5日出版。

走,先从资料的辑录入手。他查阅了史语所和北平图书馆所存的辽代碑刻拓片,并于1936年秋冬之际去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了艺风堂旧存辽代碑刻拓片。在前人《辽文存》、《辽文萃》和《辽文补录》等书的基础上,于1937年11月辑成《辽文汇》十卷、补遗一卷、附录二卷。此书虽在解放前两次排版,均因战乱而未付印,直至1953年才由中国科学院刊印。此书出版后,又经修订补充,于1981年由中华书局以《全辽文》的书名出版。这是除《辽史》、《契丹国志》之外的辽代最基本的原始资料,真可谓辽文的总集。

标点二十四史是解放后史学界的巨大工程,冯家升、罗继祖先生都曾参加过校点《辽史》工作。最后主其事的陈述先生,不仅对全书进行了标点,还校出了书中的讹误1131条,一一写出了校勘记,致使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的《辽史》校点本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上述是已出版的受陈援庵先生传承的陈述先生的主要论著。未出版的还有《辽史别录五种》、《全金代文》、《辽史补注》等。

《辽史别录五种》是《金史拾补五种》的姊妹篇。该书包括《辽史同姓名录》三卷、《辽史异名录》三卷、《辽史避讳名表》一卷、《辽史赐姓名表》一卷、《辽史氏族表》二卷,共十卷。该书的《总序》、《凡例》、《前言》、《辽史避讳表》、《辽史赐姓名表》等部分已先后发表,其它部分则未刊布。是仍作为单行本出版,还是附在《辽史补注》之中,尚未最后决定。

《全金代文》是《全辽文》的姊妹篇。此书是在《金文最》、《金文雅》、《九金人集》等金人文集的基础上,网罗当时金境中的现在各地一切方志中的金代碑刻及新出土的金石材料而辑成。

《辽史补注》的撰写,从1935年进入史语所时即已着手进行,40年代已初具规模,陈寅恪先生为此书写了序言,发表在1942年第5期《读书通讯》上,从中可见该书的体例、规模和功力。序文极力推崇补注工作的用功之勤。内迁至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史地经济研究室主办的《东北集刊》上曾刊有该研究室即将出版《辽史补注》的广告。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此书至今尚未出版。先生也一直对此书稿不断进行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此书是二十四史中继《史记会注考证》、《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和《三国志集解》之后的第五部有补有注的正史,其学术影响极为深远。国内外的辽史学界都一直关注着此书的出版工作,翘首以待。

从《陈范异同》到《辽史补注》像一根红线贯穿着陈述先生60年如一日的学术生涯,也贯穿着陈援庵先生对陈述先生的学术影响和师承关系。他们之间的深厚的师生关系堪称史学界的佳话。

陈述先生1935年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后被分配在第一组即历史研究组。组长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陈寅恪教授兼任。从北平、经长沙而至昆明,陈述先生一直在陈寅恪教授领导下进行研究工作,耳提面命,随时受到教诲。潜移默化地学习了寅恪先生传承的科学的治学方法,用这种方法来从事辽史的研究。陈述先生在运用这一方法时,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心应手的,也经过了一个不断熟练和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达10年之久。进入史语所之后,陈述先生早期写的一些研究文章如《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兄弟之年及背盟相攻之推测》、《契丹世选考》、《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头下考》等仍然没有跳出考据的窠臼。及至《论契丹选汗大会与帝位继承》发表,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路子才明显起来,摆脱了满篇的考据性,而说理性和论证性才浓厚起来。接着以这篇文章为中心,又写了一系列研究辽史的文章《亚洲之游牧民族》、《契丹民族之构成》、《初兴传说之新解与大贺遥辇迭刺之由来》、《阿保机建国之基础及其政策》、《经济政策之演变与汉人地位之升降》、《辽季党争之起伏与北辽西辽》等,结集以《契丹

史论证稿》的书名于1984年刊行。全书约10余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契丹史的专著，学术影响极为深远。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国辽史研究已摆脱了诸如《辽史拾遗》《辽文萃》等辑失补遗和考据性的乾嘉朴学的影响，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也从此确立了陈述先生在契丹史学界学术权威的地位。但内行人都会从此书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路子，不仅术语“草原本位”是学习陈寅恪先生的“关中本位”，即使书名《契丹史论证稿》也与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何其相似，足见受陈寅恪先生传承之深。此书经过修改补充于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以《契丹政治史稿》的书名再版。

40年代末、50年代初，先生集中研究辽代的纥纥问题。这是中外研究辽金元史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我国的钱大昕、王国维、日本的藤田丰八、羽田亨、松井、箭内互等学术大师都曾著文讨论过这一问题。先生先后发表了《纥纥考释初稿》、《纥纥史实论证》、《辽金元的纥纥》等一系列专论纥纥的文章，共约10万字。发掘了有关资料，论证了纥与纥字的谁正谁误问题，纥字是汉字还是契丹字、纥字的字义和读音、纥纥的起源及其性质、辽金元各代纥纥的组成及其作用等。这些论述与稍前发表的朱子方的《辽金纥纥考略》、谷霁光的《辽金纥纥史料试释》等文章形成我国一股纥纥研究热潮，在这股热潮中，先生的论述最为博大精深。

先生于1956年发表的《哈喇契丹说》是一篇极有学术影响的文章，此文虽然仍属于更深层次讨论纥纥的文章，但钩沉发微地提出了辽朝自称“哈喇契丹”的新见解尤为引人注目。西辽自称“哈喇契丹”是拉施特·哀丁《史集》和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等世界史学名著明确记载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辽朝也自称“哈喇契丹”则鲜为人知。先生旁征博引引用史实提出这一新见解后虽有人不以为然，但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契丹小字解读工作的重大进展，当辽道宗契丹小字哀册篆盖被正确全部解读之后，“大中央哈喇契丹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文”的契丹小字的明确记载，以铁一般的事实验证了先生慧眼独具的卓识远见和史学功力。其实西辽称号是史学家为了区别它与辽朝的不同而加的称号，并不是西辽的自称。西辽统治者自认为他们的政权是辽朝的继续，因而自称辽朝。另一自称“哈喇契丹”也应是从辽朝那里继承来的，说穿了，这本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1951年，根据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陈先生写了专著《中朝关系100年》，当年5月由神州国光社出版。50年代中期，根据当时国家民委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需要，先生研究了我国北方一些民族的族源问题，先后发表了《试论达斡尔的族源问题》、《关于达斡尔的来源》、《大辽瓦解后的契丹人》、《关于土族的来源》、《论鄂温克族的来源》等专著和论文。其中尤以达斡尔为契丹之后裔的观点在学界影响最大，不仅为中外学界所接受，也为达斡尔族的各阶层人士所接受。契丹文字解读成果证明，现存阿尔泰语系的诸语言中，只有蒙古语族中的达斡尔语与契丹语关系最为密切。这进一步验证了先生的观点之正确。

193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先生的另一本契丹史专著《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共206页，14万余字。书中有《汗国的性质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内外贸易及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等篇目。这是用阶级斗争学说研究契丹帝国社会经济的拓荒工作，学术意义极为深远。由于该书畅销，1978年第二次印刷。

陈述先生不仅写了高深的契丹史专著，还写了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的《辽代史话》于198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述先生除了个人的研究项目之外，还参加了许多集体项目。集体科研项目除校点二十四史外，还参加了《辞海》修订本的词条撰写工作，《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

书》民族卷的词条撰写工作,《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的编辑工作等。在这些工作中,先生都做出了贡献。

先生还担任了《辽会要》,《辽金史论集》(一至六辑)的主编工作。为这些已出版的将出版的学术专著把了学术关。

先生除了专著之外,还撰有学术论文 80 余篇,其中大部分已发表。这些论文涉及的面很广,不仅有辽代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也有文化、文字、宗教和人物方面的。不仅有辽、金时期的,也有关于其它朝代的。如《日本海正名》、《关于达斡尔地区与乌底河流域》等不仅是学术论文,也与当时国家的形势息息相关。这些论文都是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值得后来者不断学习,不断从中受到启迪。

总而言之,陈述先生是研究不厌、诲人不倦的学者的一生,他为中国辽金史的发展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做出了一杰出贡献,我们应当永远怀念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原载:《中国民族史研究》(四)1992 年

文明发端 玉龙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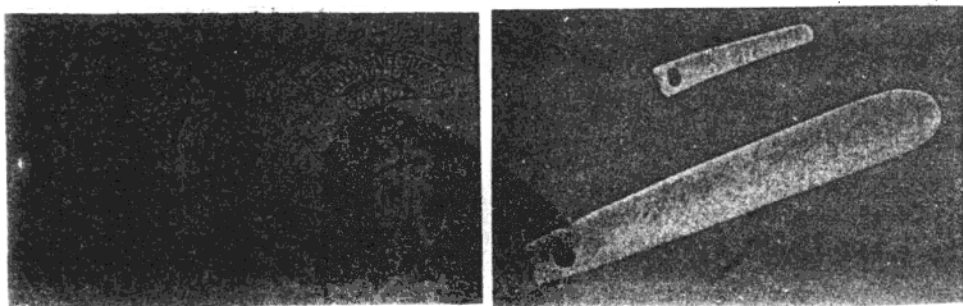
郭大顺

查海遗址位于辽宁西部丘陵山区最东部的医巫闾山西山麓、与下辽河平原接壤的阜新县境内。1982年全省文物普查时发现，到1992年已进行过4次发掘，发掘面积3000余平米，揭露出房址20余座，复原陶器近200件，还有石器、猪骨等，尤其是出土了玉器和龙纹陶片。经测定，这个遗址绝对年代为距今7600±95年。这是目前辽宁以至东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这个遗址时代虽然很早，却具有相当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方形房址，规模都较大，面积在30—50平方米间，下部直接打入基岩，每座房址内生活用具、生产工具配套，并成行排列，表现出每个生活、生产单元的相对独立性；以筒形罐为主要形式的陶器群，器类虽较简单，纹饰却复杂多变，以压印之字纹、栉目纹为主，细密整齐，布局分段有规律，并已出现了压印的勾连四字形纹饰；出土的两块龙纹陶片，都是浮雕手法，一为蟠曲的尾部，一为盘旋的龙体，不仅在形象上，而且有鳞状纹的表现纹饰，都已具备中国古代龙形象的基本特征。玉器已出土10余件，经科学鉴定，都为透闪石软玉，各类有玉玦和穿孔匕形玉饰，都是较成熟的造型，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玉器之一，在世界上时代这样早的真玉器也极为罕见。

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工艺水平较为复杂，已有专门分工，同时，使用者也都是等级身分较高的人物，说明当时社会分工已导致社会分化，这同房址、陶器、特别是龙纹出现所反映的社会生产、社会关系的进步性是相一致的，这已是中华文明的起步阶段。

查海遗址位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内，时间比红山文化早一个阶段，以筒形罐为主的陶器、压印之字形花纹、玉器和龙纹的出现，都表现出与红山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查海一类文化遗存是红山文化的前身之一，可称为“先红山文化”。从查海遗址的文明起步，到红山文化早期国家的诞生，20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在辽西地区脉络比其他地区清晰，时代也早，这就进一步证明，辽西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行一步，起过“龙头”作用。



图片

与查海遗址同一时代，面貌相近的文化遗存分布于邻近的内蒙古东南部和河北承德地区

以至北京北郊区。著名的主要为敖汉旗兴隆洼遗址，通称为兴隆洼文化。但兴隆洼遗址的陶器以划纹为主，作为查海遗址主要特征的压印之字纹和栉目纹等文化因素少见，它们应该是同时代、同一文化区中两个并存、相互依存的文化类型，以查海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可称“查海文化”。

作为查海文化主要特征的栉目纹陶器，在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多见，且分布到日本列岛的绳纹文化中，然而它们的时代已较晚。日本列岛绳纹文化中所出玉玦渊于中国大陆的轨迹，也以辽西一带最为直接，可见，查海遗址对东北亚古代文化渊流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查海遗址及其四周，没有近代村落，几年前也很少耕地，原始自然环境风貌保存极好，这里距阜新市区 20 多公里，距阜——沈公路仅 3 公里。目前，阜新市委、市政府正在利用查海遗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优越的保存条件，规划建设遗址博物馆，目标是复原八千年前村落原貌和自然环境，以“中华第一村”、“华夏第一龙”的盛名，吸引海内外人士，促进阜新的对外开放。

（作者单位：辽宁省文化厅）

原载《中国文物报》1993 年 1 月 31 日

中华第一村揽胜

于志耿

中华第一村，系指考古学上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类村落遗址。要说的这处遗址在哪里？是浙江余姚河姆渡，或者辽宁沈阳新乐，抑为陕西西安半坡，还是内蒙古敖汉赵宝沟呢？它们都不是。1992年9月4日，辽宁阜新第二届玉·龙文化节开幕。当日下午5—9时，即举行了“玉·龙故乡行回归8000年原始旅游度假”活动，为中华第一村——阜新查海遗址博物馆落成剪彩。查海遗址是国内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之一，是中国最早的农业的发源地。此处堪为中华第一村。查海遗址从1990年5月被发现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考古专家也纷纷到此考察观光。1992年8月下旬，又在此召开了阜新查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初，参加阜新契丹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也参观考察了查海遗址和博物馆。

查海，原写作察哈尔。遗址位于阜新市东郊30公里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下查海的一处扇形台地上，距村西2.5公里。其东北为查海山，南有“泉水沟”。其地形、地貌大致还保持古时模样。地下文化遗存内涵丰富，无其它历史时期遗存干扰。从阜新至沈阳的公路东北行20余公里，在接近查海村的地方，有一条折向西北的岔路，可迳直通往查海遗址。在这两条路的交岔路口左侧，矗立着一座白色大理石的基座上，塑有一站立姿势的少女，双手捧一玉块高举过头顶，左侧身旁置一之字纹筒形罐。这尊雕塑的寓意明白如画，主题人物以少女而不以少男，象征当时社会女性的崇高地位；双手高举玉块过顶，系表示玉块为神圣之物；左侧身之字纹罐，标志这里既是陶器上这种纹饰的发源地，又是其盛行、繁荣之区。总之，这尊塑像就是中华第一村的象征。沿着这座标志物左侧道路向西北进发，经过查海村，便至查海遗址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建造在阜新市东郊的一片旷野之上。其建筑形式，别具一格，系根据清理发掘出来的大、中、小居住址，并经想象复原，进行集中、排列组合，以大型房子为正面，中、小型房子为侧面，进行修筑。于远处眺望，如同一处古代村落。馆舍面积达877平方米。展厅正中为全景画馆。全景画展示，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点缀几处茅房，人们在忙碌着，有的耕耘，有的磨谷，有的射猎，有的制作陶器，有的制作石器、玉器。绘画前面，配有3座仿原始住房，仿古制陶、制玉作坊，以及当时自然风光的复原景观。全景画馆两侧辟有4个展室。东侧第1、2展室，展出遗址出土的石器，西侧第3室展出陶器，第4室展出玉器等。

石器制作分打制、琢制、压制和磨制等。打制石器数量较多，有锄形器、铲形器、刀形器，以及敲砸器等，并有个别钺形器。琢制石器主要是磨棒、磨盘，系稍加琢制而成，出土数量很多，陈列有一套十分完整的器物。压制石器数量很少，仅有细石镞1件，还有刮削器、石片石刀等。磨制石器数量也少，如石斧、石镑、石凿、磨沟石等。从出土生产工具看，以农业生产及加工工具为大宗，狩猎工具稀少，还有磨制石器的工具——磨沟石（或磨槽石），这反映手工业的存在。这些展品，反映出查海遗址是古代农业的发源地的考古学的一种模式。

陶器，多罐类，有直腹罐、鼓腹罐、斜腹罐等。以直腹罐居多。器形均较大，器壁亦较厚。还

有碗、钵、杯等。陶质疏松，以夹砂陶为主；颜色有红褐、灰褐、黑色等；火候较低。纹饰有压印之字纹、几何纹、斜线纹和压点纹等近40种纹样。多复合纹饰，单一纹饰少见。其中以之字纹为主体纹饰。重要的是展出了两块龙纹陶片。关于查海遗址，曾有多次报导。但关于龙纹陶片的消息，始见于1992年3月22日《中国文物报》，在题为《荟萃新近出土文物精华辽宁举办“近年考古发现与文物征集汇报展”》的消息中说：“距今八千年的查海遗址出土了目前国内最早的龙纹陶片和玉器。”玉器，已出土20件。有长条器、玦、匕形器、管状珠，还有如斧似铤状器等。经鉴定，这批玉器全部以透闪石、阳起石制作，属于真玉中的软玉类，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玉器，即国内首次发现的最早的真玉制品。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玉从石料中分别出来，并已掌握了较高的研磨技术，尤其是已确定了玉的专门用途，即体现人际关系有特殊价值的礼器或神器。总之，已经有了采玉、制玉、用玉的系统工程。

博物馆的后面，越过一条沟，即是查海村落遗址所在。其面积达3万平方米。遗址的重点部位为1.2万平方米，已为文物部门征用，四周立有障子，用以保护遗址，便于清理发掘。经3次发掘，已清理房址23座，出土文物千余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仍在此继续进行发掘清理。

从对居住址的发掘情况看，其层位堆积单一，房基均凿入基岩，居住面系在基岩上铺粘土垫平、打实。所有房址皆平面呈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分大、中、小三种规格。大型房址（如F6）南北长8.6、东西宽7.9米。中型房址（如F8）南北长6.4、东西宽5.4米。小型房址（如F10）约3.5×3.4米。村落布局，以较大房舍为中心，围以中、小型房舍，排列密集有序，组成自然村落。房址内有柱洞、火塘、灶址等遗迹，出土有石器、陶器、玉器等。有一座较大房址（F7）西壁内侧发现一座小孩墓葬，从中出土了玉器。灰坑遗迹多分布在房址附近。经过发掘的房址，有的把清理面展示出来，有的则已复原苫上房草，以利于遗址保护，并增添遗址博物馆的景观，供专家考察和游人观光。

此处村落遗址的年代，据层位中出土的碳样标本，首次测定碳14年代为距今6925±95年，经树轮校正为距今7600年，号称8000年。

在博物馆陈列室和《阜新玉·龙文化节活动观摩指南》上，有当代考古学大师苏秉琦先生于1991年8月为阜新玉龙文化节手书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在阜新市辽金元契丹女真蒙古族历史考古研究会编的《阜新辽金史研究》上，特载《苏秉琦教授谈查海遗址》（1991年8月20—21日）一文，明确指出：“阜新查海是红山文化的根系之一，特征有两条，一是龙、玉，一是之字纹。”

在考察过阜新的学者中间，不乏各种议论。有人听说查海遗址是中华第一村，便不客气地问：“是不是吹？”当然，可能存在比查海更早一些的村落遗址。可是，目前总还只知道这一处。据说，阜新和其它地方还有类似查海的遗址，如沙拉乡五田地，四合乡冠山沟、太平沟等地。但这些地方，均未发掘，情况不明。一般说，人类定居肯定要早于村落出现。但形成村落是人类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为氏族、部落的标志。重要的是查海遗址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大概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万年到8000年间，正是人类从游猎到定居，又从定居到形成村落（聚落）的时代，亦即是氏族、部落形成和发展、繁荣的历史阶段。试问，如果8000年的查海村落遗址不是中华第一村。那么，又能指出哪里是中华第一村呢？何况，查海遗址还出土了中国历史上、中国考古学上最早的石铲、石锄、玉玦、玉匕、玉斧（铤）、之字纹陶器和龙纹陶片呢？

中华民族是酷爱玉的民族。用玉作兵器、礼器和饰物，正是中国上古文化史的重要特征之一。玉礼器或神器，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东方类型。中国上古史上有一个玉六时代。《越绝书·宝剑篇》载风胡子曰：“黄帝之时，以玉为兵。”查海不仅出土了最早的玉玦、玉匕、玉管状珠，更出土了如斧似铍形玉器。不论斧或铍，皆刃，是为刃器。考古学上划分时期，往往以刃器的质料来划分时代。那么，如上所述，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上，该是可以划出一个特定的玉兵或玉器时代的。考古学界已有不少学者正是这样提出并论证了这一课题。查海文化的玉器早于红山文化，而且，与之素有渊源。查海玉器，也早于河姆渡文化、青莲岗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以及饶河小南山的玉器群。查海玉玦，粗壮而直径较小，浙江余姚河姆渡、江苏淮安青莲岗，以及黑龙江饶河小南山的玉玦，则较扁、较薄而直径较大，后三者具有相似性。查海玉匕，较短而凹槽较深。黑龙江延寿莲花泡遗址出土玉匕，与查海出土玉匕相类，但色泽不同。其后，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匕，则较长而平，凹槽已不明显。这大概是玉文化上 7000、8000 年间，与其后同类器物的早晚差别之一吧。总之，查海出土的玉玦是中国最早的玉玦，玉匕是最早的玉匕，玉管状珠自然也是最早的，斧或铍则是最早的玉刃器。这时的玉器，不仅是工具和饰物，更重要的是神器，或曰礼器的萌芽。这些，便是中华第一村的重要文化内涵之一。

再也不会有人怀疑，龙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可惜，至今查海还只出土了两块极珍贵的龙纹陶片。其中一块稍大，有较完整的一段龙身和尾部纹饰，尾部较完整但无尾鳍。另一块略小，有龙身的一段纹饰。两块陶片的龙身，均布满鳞片纹。似为《广雅·释鱼》：“有鳞曰蛟龙”的蛟龙。有人说，龙纹陶片上龙的尾部与仰韶文化的龙非常形象。还有人说，这不是龙而是巨蜥，或是鳄鱼。应该说，这两种动物，在学术界有关龙的起源的讨论中，均未排斥在龙起源的诸说之外，就算是吧。那么，这两块龙纹陶片也无妨说是“查海龙纹陶片”。实际上，龙作为灵物，是许多具体形象的抽象和概括，它既与农业文化的起源有关，又与东方古代原始思维和宗教相综合蕴育而成。还有人认为，这不是龙，而是虫。但，在仔细观察陶片之后，人们难以断言是虫。而且，至今考古学上还没有发现饰以虫纹的陶片。凡是能入画面的纹饰，往往都是人类生产、生活、信仰和审美的积淀，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是极难作为纹饰而装饰于陶器之上的。如果此虫若以《说文》所释，为“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中的“鳞虫之长”。或《通训·定声》“甲虫三百六十，而龙为之长”中的“甲虫”。那么，把龙纹说成虫纹，倒也未尝不可。至此，不禁使人们想起，当年，半坡遗址出土饰有人面纹图案的彩陶盆，不是也曾有人把这种纹饰说成是水虫图案吗？当然，如果发现饰有龙首纹的陶片，则这些争论也就自然休止了。查海遗址还在发掘，期望有龙首纹陶片出土问世，人们正在翘首以盼。有一种现象，非常值得注意。查海出土的陶片已不计其数，出土的之字纹陶片也已无法估算，唯其龙纹陶片仅得 2 件，何其如此稀少。其原因何在？而且，这两块陶片，火候较高，质地细腻，色彩均匀。是否可以认为，查海村中地位至高的村落耆宿或首领人物，才配享有塑有龙纹的器物呢？抑或是供奉神祇的礼器呢？出土龙纹陶片的这所房址，其在诸房址中的地位，也就值得另眼相看了。龙是古查海人的图腾，而这所房址，以至此处村落，便是龙兴之地了。“查海龙纹陶片”正是此地古时部落图腾的写照，是华夏最早的龙的图形。几年前，河南濮阳西水坡古墓出发现用蚌壳砌筑的龙、虎，现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当年报纸曾誉之为中华第一龙。这处仰韶文化遗址墓地的年代可谓早矣，距今 6500 年。但比之查海还晚了 1000 多年。看来，中华第一龙这顶桂冠，恐怕要让给中华第一村的“龙纹陶片”了。在全国范围内，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有龙的形象的文